拓展新农村题材　再塑新农民形象

——评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籽》

◎张锦贻

2019—2021年，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的王化军被派往离首府呼和浩特几十公里的胡麻营村，参与村子的脱贫和振兴工作。工作结束返回单位后，他写出了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籽》。《剥麻收籽》写的是新时代新农村脱贫攻坚奔小康的真实故事。在该书的右上角写着“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王化军在该书自序中说：“这部小说源于我的驻村日记”。“友人后记”中也强调，这本书“是作者经历的真实故事，里面的人物也是我所熟知的……”。

《剥麻收籽》书写一个重大题材，记录一段重要历史，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无疑是内蒙古文学创作中的“重量级”，是新时代文学中的“重头戏”，对于奏响时代变迁中的主旋律、传播社会变革中的正能量，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在纪实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长篇纪实小说更少。因为，既是小说，又要纪实，二者得兼，思想的拓展、艺术的创新似乎都有点难。没有拓新不行，偏于一隅也不行。长篇小说反映的，常常是一段恢宏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的故事场面，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拓新，需要有生活积累的厚度、发现洞察的深度，也必须有艺术方式的力度、运用语言的适度。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籽》显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创造的实践，不仅让作品本身焕发了光彩，也使通常意义的纪实文学形态发生了改变，使作品焕然一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纪实小说迭代更新的努力。

《剥麻收籽》全书共47万字，就题材看，以内蒙古文史馆干部文关来到胡麻营村参与脱贫攻坚为主线，由此辐射开来，写到周围几个乡的扶贫脱贫，写到社会各界对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真诚关注和实在参与。具体描述了县、镇、乡、村干部的工作、群众的状态，生动地描绘了脱贫帮扶中的步步为营，村中男女老幼的生活面貌。这一切看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王化军在面对这一题材时，却显现了他的不凡之处。他以百年来胡麻营村农民自种自榨胡麻油的史实为依据，以发展村子集体经济为由头，以“剥麻收籽”做书名，宣示了这本书的题材特征，展开对村子集体经济的独特思考。从中我们看到，村子集体经济的本质不仅仅是让农民赚到钱、富起来，更在于使大家脑子里有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念头，使脱贫与自家利益、与村子发展连在一起，用脱贫濡润人心、激励人志，升华人的精神，鼓起人的干劲，最终使脱贫攻坚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成为新时代农民迫切的精神需求。该书的思想主题、艺术内蕴由此凸显出来。

至此，作者已经把脱贫攻坚的内在含义、外在意义呈现得有感有情、有意有韵。然而，作者的用心并不止于此。作者所要呈现的，更有其深层的全新的境界和深远的崭新的未来。小说中写到文关得知，胡麻营村人人都爱用胡麻油拌馅炒蛋炸糕烩菜，也有村民开了油坊，但村集体经济却是“零”。又听说别的村有开杂粮厂、豆腐坊的，因卖不出产品无效益可言。陈旧的观念、刻板的思路，套住了村里的集体经济，投入了钱，白费了力，剩下的只有美好的希望——村民希望有个好领头，有个好奔头。这就是民心、民意。

小说写党顺应民心民意，向胡麻营村派了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精准扶贫，办好实事，逐步推进，实现脱贫。从文关进村，调查建村历史，到争取企业家投资，筹建榨油厂、注册“胡麻营”商标，再到建厂房、库房，配上瓶、箱等包装设施，直到北京销售，才算有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办了一件大事。小说主题十分明确，期间，县、镇、乡、村主要干部一一亮相，工作状态也渐渐展现。最先见到的，是腰带系在微隆肚子上、说话有点急的镇党委书记李聪明，穿一件淡粉衬衫、白净斯文的镇派驻村干部沙大旺，还有黝黑脸、寸头、裤子上有许多泥点子的村党支部书记齐二强等。急性的李聪明见到文关就即刻带他去了村里的经济林。由此先引出了经济林需要装围栏、竖在公路旁的广告牌需要租出去等问题。

没有钱、贫穷，是乡村振兴的拦路虎。脱贫攻坚，直奔主题，使这本小说的结构十分紧凑。由第一卷“零收入”，直接转入第二卷“贫困户”，具体地描述因贫穷而离异、醉酒烫伤胳膊的毛仁的生活遭遇，详尽地描写因穷困而绝望而消极抗拒一切帮扶的李占富的思想转变，以个别表现一般，用特殊揭示普遍，直截了当地写了不同贫困户的不同情形，恰是曲折有致地写出了大小贫穷村子的大小由头。乍一看，没吃没喝没活头，可是，土地在，人在；党的政策在，干部在。贫穷又从何而来？困境又怎样生成？巧妙的是，就在“贫困户”这一卷，作者同时写了一个截了腿、拄着拐、身残志不残、能靠不想靠的贫困户刘喜顺。刘喜顺养羊养牛，尽自己的力发展养殖业。他说：“我不会东阴凉挪到西阴凉，就等政府的救济粮，我只知道奋斗就会好过，不奋斗才真正难过。”作品中的文关把刘喜顺的所做所说投在县融媒体上，引来了县电视台长和采访团队。作者写道：“刘喜顺火了。”这样的对比描述、对照描写，无论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都分外鲜活、鲜亮。

之后，从胡麻营村“建油厂”初步建立起村集体经济，到公路边广告牌的出租、村里贫困户的转变、公益农机站的启用，实际地、实在地、实质地写出了村子脱贫攻坚的进展、拓展、发展，步步紧扣，环环相连。恰又在这“扣”“连”之中，不失时机地插写了有爱心、善心的女企业家张小五，对乡村脱贫攻坚的无条件配合和无缝隙对接。

让脱贫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作品的主题在小说情节的衍生中进一步深化。小说接着写到文关与张小五的合作步步踏实、件件落实。利用胡麻营村的一片空地，调动南坪乡办养鸡场的资金，联合建设退役军人扶贫创客中心和红星犬谷，更使乡村的脱贫与建设现代文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相统一。

作家不是孤立地写一个村的脱贫，胡麻营村与周围的村子衔接着、联系着、影响着，呈现出乡村的脱贫攻坚必须有大局意识、整体意识。让所有的读者都体会到，脱贫攻坚，不是一个村子富起来的小打小闹，而是中国乡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就得付出辛苦、克服艰难，就得有坚定意志、恒久毅力。难得的是，小说中，这一过程无论怎样的困难重重、挫折连连，党的政策总是闪着光辉，党的领导总是指着方向，整部小说主线明朗。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文关，无论走到哪个乡、哪个村，都不忘帮助乡村少年儿童实现梦想。先通过让红云镇中心小学的孩子到首府听交响乐音乐会、发动党校同学向乡村孩子捐赠乐器，组织了乡村孩子交响乐团；接着又将白庙乡小学的孩子带进“专业乐手+朗诵家+孩子们”的公益演出，使孩子与大人一起受到“光荣与梦想”氛围感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潜移默化教育。

《剥麻收籽》的创作主题明确，脱贫攻坚，从贫困户到非贫困户，从老人到小孩，一个都不能少。党的政策一一落实，党的领导处处体现；群众路线一一贯彻，群众觉悟处处呈现。而小说中没有概念化、说教式，每一个人物故事，每一个故事始末，都顺畅自然、顺乎自然而终究必然。生活的日常的自然，普遍的平常的天然，加上意外的时常的偶然，使这部长篇小说显示出罕见的、少有的思想高度。

一般来说，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总是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刻画来展现；而典型性格的凸显又是通过细节描绘来完成。但脱贫攻坚是一项群体性的大事情，每一件具体的事都关乎千千万万人和家庭，不是某个典型人物的某个作为所能全部概括的。作家采用具体人物具体描写、不同性格不同展示、相异情境相异铺陈的艺术方式来书写和表达。或着力地写人物的某一点，或有意地渲染人物性格的某个侧面，给人以深刻印象。前者如写贫困户刘喜顺，一边的裤管是空着的，拄着双拐，却若无其事地越过河面、吆喝饮水的羊群，又返回河岸、驱赶涉水的牛群。村里定他家是贫困户，他不当；政府对他帮扶，他不要。他，以精神的奋发战胜肢体的残疾，以意志的坚定彰显不屈的人生；后者如写基层女干部石榴，村里让她联系贫困户李占富，而李占富拒绝干部来家，不给开门。石榴天天上门，隔着门板、对着门缝，跟李占富说暖心的话。终于，李占富开门，沟通思想，帮扶完成。

从整部作品看，作家并没有全力刻画这两个人物形象，但在特定环境中刻意地专注地写了这两个特定的人物，又由人物烘托出农民中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心气，表现出基层干部坚持党的政策、深入广大群众的正气，渲染出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特定的典型环境。应该说，这样书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新时代长篇纪实小说一种创造性的创新、创新性的创造。

作品中，驻村干部文关和女企业家张小五两个人物形象得到悉心刻画。这两个人物，性别不同、岗位殊异，但都立足基层、心系百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人物形象，正是国家富强民主、社会文明和谐的特定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不可忽视的是，作品中对人物的细节描绘，因为完全来自真实的生活，逼真而传神，切实而有趣，不仅写得活龙活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还把当时当地的情境、氛围写得有板有眼、有动有静，人物的心神、事情的格调，都显现无遗。所以，书中的人物虽然不少，却个个都能认得清楚、看得分明。

显然，这是一部有时代高度、有思想深度、有艺术力度的书写新时代新农村新变化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接地气、有底气、扬志气的好书。

典評

壮志凌云向青山

——大型舞台剧二人台《王老太太》观后

◎郑晓峰

连绵巍峨的大青山和开阔平坦的土默川平原，哺育着各民族人民在这里生生不息，孕育着传统文化的深沉厚重，传颂着光荣的红色革命故事。在这片热土上，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土默特右旗乌兰牧骑（土默特右旗二人台艺术团），是内蒙古自治区75支乌兰牧骑里唯一一家增挂二人台艺术团的红色文艺队伍。

2023年在二十四节气中第20个节气——小雪的晚上，笔者在包头大剧院观看了由土默特右旗乌兰牧骑演出的大型红色革命舞台剧二人台《王老太太》。舞台上上演着虽已久远但却让我们中华儿女刻骨铭心的抗日故事。王老太太的故事，笔者早已了解，并已参观过她的故居。王老太太本名乔培玲，1902年，19岁的乔培玲与美岱召镇河子村的王建业结婚，成为土右旗美岱召镇河子村王家大院的女主人。该剧就是围绕这位可歌可泣的革命母亲和她的儿女们，在巍峨的大青山和土默川平原上的英雄事迹编创而成。该剧让我们在感受红色革命故事带来的震撼的同时，也欣赏到了二人台的独特魅力。

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赓续，是土默特右旗乌兰牧骑这支旗县区级文艺队伍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探索。

二人台《王老太太》是在一个土默川农村中每逢喜事必看戏的场景中开场的，喜事就是为新房上大梁，为此请来了全村的老乡们观看传统剧目《杨家将》。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意义之一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农村中给新建的房子上大梁，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颇具仪式感的过程。该剧中，当喜庆的人们即将把房梁抬上顶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

对于王家大院这个家庭来说，这个院子首建于清末，1916年被土匪卢占魁匪部烧毁；后重建于上世纪20年代，1940年又被日寇所毁。历史上真实的王家大院先后兴建和被毁，反映出动荡年代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和人们渴望安定生活的宿愿，土匪、日寇，一个烧我家园一个欲灭我家国，从一个小小家庭的生活生存环境上，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华民族必将毅然奋起抗争的必要性。

在中华文化中，听戏看戏是一种民族特征十分鲜明的生活方式。除有着娱乐的功能属性外，许多创作者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其中。在各戏曲种类中，都保留着以历史人物改编的传统剧目，如《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定军山》等等。

新房上大梁、看戏，这两者具有中华传统寓意的生活方式采用了艺术形式的表达，营造了典型的人文环境，为二人台《王老太太》中人物的塑造和红色故事的构成做出了合理性和艺术性的索引。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二人台《王老太太》把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戏剧事件中呈现，成功地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爱国情怀在戏剧演出中激活。

红色革命剧目，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内容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真理和取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展现出来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可以让观者再次走近和重温那段红色革命历史。

二人台《王老太太》的人物原型，在当时已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农村老太太，膝下有三儿一女。她本应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却毅然参加了革命。

家园被毁、家国被蹂躏，王老太太带领大儿子和孙子、孙女全家人上了大青山，和游击队一起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生活。她经历了大儿子王培玉的牺牲、三儿子王如玉的失踪，孙女王友梅也因在大青山上缺粮少药病饿而死。失去亲人的打击一次次地压向了她，有人问她：“你家生活富裕，家大业大，出来受这份罪干啥？”她说：“死也不当亡国奴，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就会苦尽甜来，就会过上好日子。”延安来的记者根据王老太太的经历含泪写下报道《革命的母亲》，她的故事从此传遍了整个晋绥根据地。王老太太带领全家参加抗日斗争的感人事迹，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中广泛流传。

根据真实人物和事迹编创的红色革命剧目，再现了红色革命历史。典型人物王老太太历经磨难、百折不挠，以她为典型代表，她与家人、身边的父老乡亲奋起抗日救亡的斗争精神，崇高纯洁、深邃远大，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我们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迎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归根结底是得益于像王老太太这些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的英勇奉献。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土默特右旗，北靠阴山，南临黄河，在历经多次的移民活动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交融，适宜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为二人台的孕育和发展提供着滋养。

土默特右旗作为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当地的二人台艺术202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笔者有幸成为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参与了文本撰写等具体工作，并与数位土默特右旗文化名家一道，重温着二人台的艺术魅力及对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感受到土默特二人台的精髓所在，用笔触抒发着对二人台的热爱。

二人台《王老太太》用本地区方言道白，运用“夸嘴”等二人台表演形式，对本地区文化和二人台艺术形式做出极好的诠释，也对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支撑。

对于二人台表演中的方言，有种看法说是阻碍二人台发展的一个因素。本地区以外的人听不懂方言，便会难以接受和喜爱。但是，因为二人台在音乐旋律和唱腔的韵律上，都保留有中华审美的元素，所以本人感觉二人台表演中方言的运用，观众在欣赏时并无生疏之感。

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撰写文本时，土默特右旗二人台艺术中的“蒙汉风搅雪”，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他是与晋陕蒙等其他地区二人台表演上的一个鲜明之处，也是成功申报的关键点。同时，这种艺术形式还蕴含着民族团结的具体而生动的呈现。

从土默特右旗流传下来的传统二人台剧目，不但有传统带鞭戏《挂红灯》等超出了其他戏曲种类的表演形式，还有传统二人台牌子曲等音乐方面的优势，剧情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是二人台在土默川平原流传和被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基础。二人台《王老太太》在表演、音乐方面，需要在深入挖掘传统二人台的特点上加强其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坚守好守正之路。

中华文化中有着对人生悲剧性现象的思考和艺术的表达。从很多传统剧目来看，将悲痛转化为希望和力量，是我们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表达形式，也是文化自信的表达方式。二人台《王老太太》的最后一幕，大青山上满天飞雪，王老太太得知两个儿子为革命相继牺牲、失踪，又亲眼目睹孙女牺牲，失去亲人的打击一次次地压向了她，但她像大青山中九峰山上的松柏，不畏风雪、岿然挺立，唱出了“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的高亢唱段，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在她心中更加坚定。

二人台《王老太太》这部红色革命剧目，再现了峥嵘岁月，激发了爱国热情，弘扬了革命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和推出一批这样的经典红色革命剧目意义重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北疆文化将产生积极意义。

品鉴

谈非遗与闪小说的叙事融合

◎犁夫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昆曲、古琴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侗族大歌、玛纳斯、花儿、西安鼓乐等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闪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具有灵活多变的创作形式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于非遗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内蒙古闪小说创作社推出的“非遗闪小说”系列，为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一）非遗的叙事特点

非遗的叙事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口头传承和表演性上。非遗项目往往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表演和展示，这种表演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叙事。非遗的叙事往往融合了历史、民俗、传说等多种元素，通过讲述者的口才和表演技巧，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文化内涵生动地展现给受众。

作家刘国琳推出的辽西影人系列闪小说，把中国皮影写得惟妙惟肖，从《刀大师》《箭杆王》《十不闲》《小翠红》《白小宝》《谭弦子》《甄翰林》等众多的人物和情节里，读者仿佛走进了一个皮影世界，在那里领略皮影的魅力，感受皮影人的风雨人生。

（二）闪小说的叙事特点

闪小说作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形式，具有短小精悍、情节紧凑、意蕴深远等特点。闪小说通常以600字的篇幅，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情节，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闪小说的叙事往往追求出奇制胜、扣人心弦的效果，使读者在短时间内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和思考。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实践价值

（一）融合的契合点

非遗与闪小说在叙事上具有天然的契合点。首先，非遗的口头传承和表演性为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其次，闪小说的短小精悍和情节紧凑符合非遗传播的需求，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第三，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与闪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融合的基础。

作家连河林的十二生肖闪小说系列，紧紧抓住生肖特色，挖掘非遗故事，让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吸引读者。《子鼠·鼠王开会》《丑牛·老牛》《寅虎·最后的虎威》《卯兔·鹰和兔》等众多篇什，娓娓道来，让人饶有兴趣地听下去。

（二）融合的实践价值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的融合具有多方面的实践价值。首先，这种融合有助于非遗的传承与传播。通过闪小说的形式，可以将非遗项目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文化内涵，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受众，提高受众对非遗的认知度和兴趣度。其次，非遗的丰富素材和灵感来源，可以为闪小说创作者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和思路。第三，非遗与闪小说的结合可以形成具有独特魅力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技巧

（一）深入挖掘非遗资源

在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挖掘非遗资源，提炼出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同时，需要关注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将其融入到闪小说的创作中，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创新叙事手法和技巧

闪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需要不断创新叙事手法和技巧，以适应非遗叙事的需求。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借鉴传统叙事手法和现代叙事技巧，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等方式，将非遗项目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受众。

（三）强化受众参与和互动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强化受众的参与和互动。可以通过举办非遗主题闪小说创作比赛、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到非遗与闪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鸣和影响力。

李富的《留一针》、老李飞刀的《舞台》、刘习鉴的《书砖》、迟占勇的《悲角儿》、沈运红的《这样也行》、孙德俊的《祖传》、李素琴的《小满》等等，都是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精品。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文化尝试，我们需要将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纳入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整体框架中来，形成更加有效的保护和传承策略。

纵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